

“三言二拍”牙婆形象负面化探析

张博阳¹, 蔡萍²

(1.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83;

2. 青岛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20)

摘要:明代小说“三言二拍”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但小说中的牙婆基本是贪图钱财、助纣为虐的恶人形象,对牙婆的叙事存在类型化的负面化问题。牙婆形象负面化的主要原因有:牙婆对社会秩序危害性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牙婆无依无靠的经济地位根源、儒家贞节观与教化思想的文化根源、男性话语主导的性别歧视根源以及牙婆年老色衰的生理根源。“三言二拍”中牙婆形象的负面化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有父权制社会和男性文学传统下的女性形象失真的表现。

关键词:三言二拍;牙婆;负面化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1)02-0074-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1.02.011

On the Negative Image of Yapo in “Sanyan Erpai”

ZHANG Bo-yang¹, CAI Ping²

(1.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520,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s of Ming Dynasty “Sanyan Erpai”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shaping characters, but in these novels, the yapo (matchmaker) is basically a stereotyped villain who is greedy for money and helps the wicked. There is a negative typological problem in the narration of yapo, for which the main reasons includ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oot of the yapo’s harmfulness to the society, their helpless economic status, cultural root of Confucian concept on chastity and thought on edification of people, sex discrimination in the male-controlled discourse, and physiological root of the aging and charm-declining yapo. On the one hand the negative image of yapo in “Sanyan Erpai” is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female image distortion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he male literary tradition.

Key Words: Sanyan Erpai; yapo; negative image

“三言二拍”作为明代短篇小说名著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当前“三言二拍”人物形象研究逐渐细化,除了主要人物

之外,还包括配角如义仆、教师、盗寇和牙婆等次要人物的研究。在次要人物中,笔者比较关注边缘人牙婆。牙人是指贸易中促成买卖双方

作者简介:张博阳(1997—),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交易的中间人,牙婆则是指从事这一职业的女性。牙婆属于“三姑六婆”^①这些传统女性职业中的一种。牙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释为:“旧时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从中取利的妇女。”^[1]但在“三言二拍”中,牙婆往往身兼数职,从业内容涵盖了沿街卖货、说媒拉纤、买卖人口、看病接生等多个方面。武荣强在《也释“牙婆”》一文中将牙婆释为:“旧称从事介绍人口买卖或其他生意以赚取一定佣金的职业妇女,她们有时也直接从事某种买卖,抑或从事做媒的活动。”^[2]这一定义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三言二拍”中牙婆的形象,也将牙婆作为中间人赚取佣金的职业特点体现了出来。故本文牙婆的概念参考这一定义,只是根据“三言二拍”的文本,会更关注牙婆在撮合男女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以往的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牙婆形象的负面性,比如,有学者认为她们葬送了很多女性的贞节和幸福^[3];或者认为她们的言行有悖于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伦理道德^[4]。但也有少数学者发掘出了牙婆形象的正面意义,比如,有学者指出牙婆的存在能反映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5];也有学者“将婆子、丫环、尼姑作为有共性的整体”来研究,认为她们是“闺阁女性的爱情导师”^[6]。虽然对牙婆形象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具体的文本分析还不够深入,对牙婆形象负面化的原因分析还相对不足,故本文以“三言二拍”为文本范例拟对这两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一、“三言二拍”中牙婆形象负面化的表现

在“三言二拍”的200个故事中,近四分之一的故事中有帮助女主人谈情说爱的女性配角,其中以撮合男女关系为副业的婆子类配角——牙婆出现在19个故事中。这些牙婆大都有卖珠子、卖花、篦头、看病等日常主业,具有

接近闺阁女性的便利性,从而兼职撮合男女关系收取佣金。相对丫鬟类配角出现于11个故事中、尼姑类配角出现于7个故事中,牙婆配角最多。但有些故事中的婆子只是单纯做媒,没有推动故事情节,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计押番金鳊产祸》《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和《黄秀才微灵玉马坠》中的婆子,故在此不作分析。笔者整理发现,“三言二拍”中有明显推动故事情节作用的牙婆主要出现在以下15个故事中,小说作者对这些牙婆或多或少都有负面描写,本文根据负面描写由低到高的程度,将这些牙婆负面化形象分为四类,具体分类和分析如下。

(一)第一类:具有主观善意、负面描写较少的牙婆

“三言二拍”中有较少负面描写的牙婆,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团圞捷报旗铃》中的杨老妈、《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的王婆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张六婶。前两位牙婆主要是“牵媒拉线,成人之美”,具有主观的善意,推动了两对青年男女真诚爱情的形成,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聪明果敢,能力超群:“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知人病轻重。”^{[7]173}她了解到周小姐患了相思病而一病不起,决定为其排忧解难。她主动向周小姐的母亲讲明原委,并直入周小姐爱恋的范二郎家说亲。由此很快治好了范、周二人的心病。而周父回来却嫌弃范家开客店,不能与之门当户对,断然否定了这门亲事。周小姐被气晕倒地,周父竟然不允许救治,骂道:“辱门败户的小贱人,死便教他死,救他则甚?”^{[7]175}这直接导致女儿气绝身亡,而后被草草埋葬,最终成为孤魂野鬼。与迂腐冷酷的周父相比,王婆作为一个外人却能以救周小姐性

^① “三姑六婆”语出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姑者,道姑、尼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指女巫)、虔婆(指妓院老鸨)、药婆(指以治病为业的妇女)、稳婆(指以接生为业的妇女)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版,第118页。

命为要,为成全有情人竭尽所能,可见她有善良的一面。再如,《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图圈捷报旗铃》中的杨老妈,她得知张幼谦和罗惜惜两情相悦,杨老妈说:“随你分付,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尽着老性命,做得的,只管做去,决不敢泄漏半句话的!”^{[8]311}体现了她成人之美的真诚。在杨老妈的说合下,两人即将喜结连理。但罗父却中途反悔,要将女儿另嫁给更有钱的人家,后来多亏了杨老妈暗中撮合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时代,媒婆往往充当封建包办婚姻的帮凶,而王婆、杨老妈这两位牙婆却能够理解不同门第的青年男女两情相悦的爱情,并为之奔走,从中撮合,难能可贵。但是这些成人之美的牙婆在“三言二拍”中很稀有,且其产生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虽然最初王婆说合成功,但毕竟没有得到周父的允许,自作主张为两家说亲,还是有贪图佣金的嫌疑,而且传递有情人彼此中意的信息,给了周小姐不切实际的幻想,间接导致了周小姐的死亡悲剧。在第二个故事中,作者将男女主人公结合的主要功劳归于爱惜人才的县宰和恰好得到高中捷报的幼谦,牙婆的撮合之功被弱化。而且作者还不忘描写牙婆贪财的一面,如作者多处描写为张、罗二人奔走的杨老妈收受钱财的场景。杨老妈见到钱的反应是连忙堆下笑来,这时作者补充道:“杨老妈见了银子,如苍蝇见血,有甚么不肯做?”^{[8]311}此评语显然有刻意将牙婆形象负面化的痕迹,但毕竟婚姻大事有求于媒婆,给一定辛苦钱也在情理之中。

后两个故事中的牙婆也有少量贪财的负面性,但故事的结局却相对圆满。《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的王婆因贪财而替贵妇柴夫人说亲,却被郭威打,但柴夫人以金钗为酬,又以二十五两金带为定物交给王婆。此处作者点明,王婆冒着再次被打的风险继续说亲依然是因为利动人心。《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张六婶为刘、孙两家说亲成功后,刘家儿子染重病,刘母害怕人

财两空,要如期娶孙家女儿,孙家母亲担心女儿嫁过去成为寡妇,就让自己的儿子男扮女装替女出嫁,张六婶虽了解两家的隐情,但为了佣金,两家都不敢得罪,只好两边说谎,最后好在以两家儿女双双结亲为故事结局。这类牙婆的特点主要是贪财,属于负面性较少的,但在“三言二拍”中此类牙婆人数很少,不占主流。

(二)第二类:具有贪财恶意、被利诱协助男性作恶但尚未致人死亡的牙婆

这类牙婆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故事中,作者对其作恶细节有较多描绘。贪财几乎成为这类牙婆形象的标签,其中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比较典型。作者写卖珠子的薛婆被商人陈大郎利诱从而答应撮合其与有夫之妇王三巧相好,并评论道:“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9]6}薛婆在金钱动力下老谋深算,煞费苦心,历经半年之久使得王三巧被陈大郎勾引成功,但奸情暴露后王三巧被休。由此薛婆家被王三巧的丈夫蒋兴哥打得片瓦不留,薛婆被迫迁居邻县,遭到了恶报。再如《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张牙婆,她的重利特征在贩卖月香及其仆女养娘时同贾婆的讨价还价中充分显现出来,她先是抹掉卖家贾婆索要养活二女的饭钱,又以养娘是粗货不值原价三十两为由,硬是压下十两来,与自己的外甥做了媳妇。还如《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张媒和李媒,为了得到百十贯钱的资费,替年过六旬的张员外隐瞒二十岁,欺骗女方说成了亲事。《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中,韩秀才来找王婆说媒,王婆见他是个穷鬼并不理他,待秀才拿出银子,态度则立刻好转。还有《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婆婆,洪官人看上了小娘子,故意放下简帖,让其丈夫误会妻子与人有染,小娘子被休后被赶出家门,洪官人授意婆婆假冒小娘子姑姑骗她嫁与自己,最后洪官人与婆婆都得到了惩罚。虽然这个故事中没有直接写婆婆贪财,但可以推测出没有洪官人的利诱和授意,婆婆也不会主

动去冒充小娘子姑姑行骗。这类牙婆重利轻义,违背良心,只要能得到钱财,也不管是否欺骗主顾,只是她们没有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三)第三类:既贪图钱财又被男性胁迫致人死亡成为作恶从犯的牙婆

这类牙婆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故事中。为了谋生,牙婆毫无尊严。很多好色之徒在需要时尊称她们一声“干娘”,不需要时又辱骂她们为“老猪狗”,对她们多是威胁,逼迫她们最终成为他们的帮凶。其中以《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陆婆比较典型。浮浪子弟张荇私下里和少女潘寿儿眉目传情,张荇利诱陆婆让其促成二人幽会。陆婆的儿子陆五汉发现端倪,则威逼陆婆,陆婆只好如实相告张荇要去与潘寿儿幽会的事情。陆五汉表面上劝母亲放弃这档营生,暗地里却假冒张荇与潘寿儿偷欢。潘家父母发现了女儿的异常,便与女儿换了上下房,陆五汉夜间来时发现床上是两个人,怀疑潘寿儿有了他人,于是心生恶意,杀害了他们。最终,潘寿儿在公堂上羞愧自尽,陆五汉秋后问斩,陆婆被判处徒刑。陆婆受到浮浪子弟张荇利诱和亲生儿子威逼的双重压迫,只好昧着良心选择沉默,从而导致潘家白丢了三条人命,自己的儿子也被处死,造成了严重恶果。《金海陵纵欲亡身》中的女待诏也是被高官胁迫作恶的。丞相金海陵想要接近有夫之妇定哥,叫来女待诏先赏她十两银子,这女待诏知道金海陵霸道,不敢接受,金海陵怒道:“你这老虔婆(虔婆指妓院老鸨,也是当时对中老年妇女的一种辱骂性称呼),敢说三个不去么?我目下就断送你这老猪狗!”“只这一句,吓得女待诏毛发都竖了,抖做一团”^{[7]320},只好任由金海陵驱遣,最后定哥被金海陵厌弃杀害。还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王婆,赵昂贿赂王婆私通沈洪之妻皮氏,并想要谋杀沈洪霸占其财,皮氏也与他沆瀣一气,从王婆处获得砒霜,药死了沈洪,并利诱王婆,隐瞒事实真相,共同嫁祸于玉堂春,后来事情败露,王婆被治罪。以上这些牙婆都被卷入了男

性主导的偷情事件中,她们贪图钱财,又受胁迫从中牵线,成为男性作恶致人死亡的帮凶,因此都遭了恶报。

(四)第四类:具有完全恶意、谋财害命、成为男性罪犯共犯的牙婆

这类牙婆主要出现在以下3个故事中。如《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王婆,她并未受到胁迫只是唯利是图,或是与歹人汪锡串通一气拐骗良家妇女到其住所,引来浮浪子弟勾搭取乐;或是直接拐卖妇女,从中谋利。最后王婆在公差抓捕她时畏罪而悬梁自尽。再如《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的婆子,其与贼人长期合作,成为买卖妇女犯罪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的中年婆子,通过卖惨来欺骗良家妇女后,又与同伙将其拐卖。这类牙婆在“三言二拍”中没有被详细刻画,仅有的语言描写和神态描写都是展示她们满嘴谎话、不择手段、毫无心肝的形象,她们的出现主要是完成作恶任务,成为与男性共谋犯罪的工具。

综上可见,“三言二拍”中牙婆的主要工作是撮合男女关系,基本是负面形象。一方面作者多次刻画牙婆见了银子如“苍蝇见血”般的贪财形象,并对其唯利是图进行补充评论;另一方面作者有意将牙婆的恶行放大,即便她们是男性的帮凶,也特别突出其贪财的主观恶意。比如《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主要是由于张荇和陆五汉的好色以及陆五汉的残忍导致了四人死亡的悲剧,而陆婆只是贪图钱财,她在日常生活中被儿子打骂,完全没有母亲的尊严可言,遭到儿子威胁完全无力反抗,只能任由儿子处置,她没有害人性命的恶意,最后还是以存在“说诱良家女子”的行为被依律问罪。还有《玉堂春落难逢夫》中赵昂与皮氏才是主犯,王婆只是从犯,但作者刻意强调砒霜是王婆从生药铺赎来的,将她作为作恶工具,从而被一并治罪。对于受害者来说,罪魁祸首是见色起意的好色之徒和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但牙婆作为被迫的

从犯或共犯都不得善终,成为男性恶行的陪葬品。作者在小说中基本没有对牙婆的成人之美进行正面评价,也几乎未见对牙婆被逼无奈的生存困境表现出同情,所以“三言二拍”中的牙婆形象基本是负面化的。

二、“三言二拍”牙婆形象负面化的原因

“三言二拍”牙婆形象基本负面化的原因很复杂,本文尝试从以下五方面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历史和现实根源:牙婆职业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性

历史上牙婆形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负面化的。从职业属性来看,牙人自先秦时代产生以来,曾经受人尊敬,随后经过唐宋时期的不断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至元代出现了牙人组织——牙行,明清两代牙行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然而牙人的社会地位到唐代就已经开始下降了,牙人被看成了一种卑贱的职业,牙婆尤其如此。宋元时期“三姑六婆”的形象几乎离不开一个“贪”字。南宋袁采曾于《世范》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于妇人以买卖针黹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10]元初赵素的《为政九要》提到“三姑六婆”这一名词时,还被视为与“淫荡”相关^[11]。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对“三姑六婆”的评价是:“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12]牙婆已经类同奸盗。明代虽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社会上依然对牙人群体的逐利本性加以鄙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一生经历坎坷,易代之际,他从读书人一心求仕,到被迫经商,最后破产无本经营,为了生计成为牙人。历经各种沉浮,他感叹道:“民之为道,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贾为下者,为其利也。是故君子不问货币,不问赢绌。一涉于此,谓之贾风,必深耻之。夫贾为下,牙为尤下……”^[13]

因其有在各种社会阶层谋生的经历,深感牙人社会地位最低,故所言非虚。此外,牙婆负面形象在明代也基本定型,这可以从明代小说、笔记等的描写和记载中看出,如明代《金瓶梅词话》中帮助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导致武松一家家破人亡的王干娘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牙婆形象。明代大才子杨慎说“三姑六婆”是“廉耻尽绝”,明代另一位才子徐祯卿也骂“三姑六婆”为“闺中之贼”。明末清初理学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绎义》(也称《朱子家训》)有“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条较全面地概括了“三姑六婆”的作恶行径,最后告诫人们“永禁往来,庶无他患”。当时社会中确实不乏牙婆收人钱财撮合不正当男女关系或买卖女性的事情,导致许多良家妇女被勾引失贞,有的沦落风尘,有的家破人亡,造成了很多社会悲剧。对于牙婆的这种所作所为,时人深恶痛绝,但又不能正视“男女无媒不交”的现实弊害,所以只能借骂媒妁来发泄其通婚时上当受骗所受的怨气^[3]。可见“三言二拍”中的牙婆形象负面化有其历史和现实依据。

(二)经济根源:无依无靠的社会地位与唯利是图的生存方式

明中叶,商品经济和市镇经济走向繁荣,纺织业、商业发达,餐饮、演艺和娱乐等服务业需求上升,女性从业者大量增加。但牙婆作为职业女性所从事的中介行为却受到鄙视。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道:“世间有四种人惹他不得,引起了头,再不好绝他。是那四种?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上三种人犹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们怕冷静时,十个九个到要扳他来往。”^{[9]10}由此可见,牙婆几乎在鄙视链的底端。而且牙婆大都是中老年女性,父亲、丈夫往往过世,儿子也大都无能,难以赡养她们,她们无依无靠成为弱势群体,所以其经济地位极其低下。牙婆难以在经济上“从父”“从夫”和“从子”,也没有其他生产资料,只能自食其力做中介生意,依靠佣金生存。她们被迫抛头露面,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习俗,传统道德

对其失去了约束力,她们游走于市井之间,巧舌如簧、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厚颜无耻成为她们的行为方式。牙婆全凭一张嘴获得中介行业的佣金,似乎一本万利,这无异于是对士农工商传统社会阶层的极大挑战,而且动摇了社会经济的根本,因而更加受到重义轻利的文人士大夫的唾弃。

(三)文化根源:儒家贞节观念和教化思想的文化背景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所有道德要求中,贞节观念为首。牙婆职业最令人诟病的不是贪财而是引诱妇女,导致女性失贞。《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评价媒人为:“教唆织女害相思,引得嫦娥离月殿。”^[14]《酒下酒赵尼媼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评论道:“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因为她们常常“无事诱出有事来”^{[8]54}。明初统治者加强了对女性的教化,颁布了许多女教书,如马皇后的《女诫》、仁孝皇后的《内训》等,《明史》中的《列女传》讲述了200多位女性如何守节的故事。明代宗法家族的训诫、男性权威对贞节的推崇、政府的宣扬和奖惩政策都强化了女性的贞节观念。女性守贞、守节几乎演变成为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大量女性为了贞节的名声成为自愿和主动的受害者,甚至不惜付出生命,所以大批贞女烈妇出现,明代被封的烈女人数是历代之最。由于女性的生育功能,她们的越轨行为可能涉及到宗法社会重要的子嗣问题。女性的偷情不仅仅是从颜面上让家庭的尊严受损,更是威胁到了家庭血统的纯正性。封建士大夫对于那些偷情失贞的女性,不仅有道德层面的批判,还有对女性身份体认的质疑和生命存在意义上的声讨。所以进入深闺之中引诱妇女失贞的牙婆被视为破坏男女关系之大防的罪魁祸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官员或是发布条约,号召民众抵制“三姑六婆”,禁止与其往来;或直接运用司法手段对“三姑六婆”中民怨较大的妇女进行惩治。官方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作家在创作中对牙婆的态度。在明

朝宣扬人欲和主情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过于严苛的贞节观和守贞行为,质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合理性,由此在“三言二拍”的个别故事中作者对妇女失贞也表现出极其有限的宽容,但对其背后推手——牙婆却给予了更为明显的谴责和鞭挞。

“三言”的作者冯梦龙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贽影响较大,他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感的流露;晚年时期又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想用文学创作来唤醒世人,其警世思想与王阳明的救世思想实现了融合。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言中认为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15],并推崇通俗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冯梦龙还提出了“情教”主张,在《情史》中他说道“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16],包含有以“情教”取代儒家“教化”论的意图。冯梦龙在其所作《智囊》中,专门列“闺智部”颂扬女子的才智,他质疑“妇人无才便是德”的言论:“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并将男子比如日,女子比为月,“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齐也;日歿而月代,妇所以辅也”^[17],意即夫妻平等和女子辅助男子之意,这都体现出冯梦龙较为进步的女性观。“二拍”的作者凌濛初在其作品中虽反对男尊女卑、贞节守身,但又津津乐道于女子殉节。“三言二拍”虽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对情欲的肯定,但在创作中两位作家却都不约而同地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牙婆形象负面化,在作品中整体上表现出劝善惩恶的格调。如在“三言二拍”结局比较悲惨的《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一文中,潘寿儿一家三口全都身亡,杀人者陆五汉被处死,牙婆被论罪,而见色起意、挑起事端的张荃却“吃了长斋,立誓再不奸淫人家妇女”^{[7]216},元凶因认真悔过得到了善终。作者在这个故事中对被利诱而牵线的陆婆说要“杀却虔婆方出气”,直接把牙婆当作了出气筒和替罪羊。牙婆恶有恶报和元凶洗心革面的结局充满了教化意味,这反映了作者复杂的创作心态,也反映了明末思想解放洪

流的不彻底性和对封建道德冲击的有限性。

(四)性别根源: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父权制文学传统

男性牙人在明清时期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不甚高大,如《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就有不少男性牙人都是负面形象。在“三言二拍”中,与牙婆这一女性牙人形象相对应,也有一些男性牙人形象出现,但都一笔带过,缺乏具体情节,还是牙婆的负面行为更被作者着力塑造。在父权制社会,男性中心意识渗入了包括语言系统在内的所有文化机制之中,男性作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塑造出虚幻的女性形象。而牙婆不论是对情欲还是对物质欲的追求都颠覆了封建士大夫中意的温柔端庄、贞节娴静、忠于男性的理想女性形象,因此牙婆在文学作品中只能被塑造成口诛笔伐的负面形象。男性作家将牙婆视为邪恶的代名词进行负面化,表面上是文本情节的需要,但从深层来看,存在男性社会对他们一直压抑的女性力量的畏惧。明末社会不少普通的女性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反抗封建礼教,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还有一批优秀的女性诗人如吴江叶氏家族的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她们的文学成果极大地展现了女性的才华。还有的妇女抛头露面,寻找属于自己的娱乐活动,“都人好游,妇女尤甚”,“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卢,虽车马杂沓过,不顾”^[18]³⁸。这部分女性呈现出“反叛型”特征。牙婆也是“反叛型”的一类女性,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女性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表现为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和自我意识。她们不再是单纯的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是具有复杂社会属性和独立人格的“人”。在男性看来,女性的自我力量是异常可怕的,这种力量可以随时使男性发觉——男性统治神话不过是一种幻觉^[19]。牙婆身上体现出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反叛性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是封建士大夫视为洪水猛兽需要鞭挞的真正对象。这也是在小说中几乎所有牙婆都没有善终的根源之一。

(五)生理根源:年老色衰、老而无用的生理状况

“三言二拍”中的牙婆们基本只被冠以丈夫的姓氏,被称为某婆、某妈,有的还省去了姓氏,直接称为婆婆或婆子。但同是配角,“三言二拍”中撮合女主人私情的年轻丫鬟其所作所为与牙婆类似,却都有名字,且很有诗意,如碧云、明霞、龙香等。相对而言,牙婆的配角地位更显得无足轻重。“三言二拍”中很多年轻美丽的丫鬟会成为主母的从嫁,相对于年老色衰的牙婆,还很有利用价值。明代社会,市民文学逐渐繁荣,即便是社会底层卖身的妓女,在文学作品中也塑造成了诸多类型的正面的主角形象:烈女形象,如《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中任凭任何毒打都不污蔑他人的严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以死来控诉负心人和不公社会的杜十娘;贤妻形象,如《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信守诺言、隐忍耐劳的赵春儿,《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忠贞不渝、劝勉爱人的玉堂春;还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拒绝富家子弟、嫁给珍爱自己的卖油郎的智慧女性莘瑶琴等。这些女性大都有苦尽甘来的圆满结局。相对于明代小说中大多数或个性鲜明或正直善良的丫鬟和妓女而言,牙婆同为女性其形象却基本是负面化的。牙婆的从业者基本是中老年女性,年老色衰是牙婆被社会歧视的生理根源。牙婆老而无用后面临的生存压力也让她们主动放弃了尊严,如《金瓶梅词话》中的王婆说出了“俺这媒人们都是狗娘养下来的”^[20]如此自轻自贱的话语。丫鬟、妓女和牙婆都是社会底层中讨生活的职业女性,前两者出卖技艺和色相,后者靠体力和才能谋生,都一样是被压迫女性,而文学形象却出现了褒贬对立,两极分化非常明显。牙婆为了生存不得不身兼多职,甚至看病、接生等专业技能都要具备。牙婆形象被负面化的生理根源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其实这符合老年女性被负面化的历史。明代身兼数职、能言善辩、有时也成人之美的牙婆形象基本被负面化,

与西方中世纪将中老年女性黑化为令人恐怖的女巫如出一辙。

三、结语

“三言二拍”中的牙婆无论是恶人的从犯还是共犯,她们的恶行都应受到严厉谴责,因为她们作为陌生人深入闺房接近良家妇女并对其进行游说和诱惑,使得好色之徒有机会染指。以上15个故事中只有两三个是女主人公在牙婆的帮助下与心上人结合而结局圆满的故事,其他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在牙婆的撮合下走上了或惨死或沦落的悲剧命运的不归路。这说明牙婆的确害人不浅,危害社会。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牙婆自作孽而死有余辜、作家对她们负面化形象的刻画是理所当然的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理由如下:首先,牙婆从事人口买卖的职业确实卑鄙可耻,但规定仆人等可以像货物一样买卖的不是牙婆,而是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雇觅人力”有记载:“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妻、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并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21]可见奴仆可以买卖,牙婆也有官私之分。如《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贾昌问要多少身价,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上面有十六岁的养娘和十岁的月香的卖价,卖完后李牙婆“将两个身价交纳官库”。可见李牙婆是官家身份,官家买卖人口是合法的。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了多处牙婆作为中介熟练地相人买卖“瘦马”^①的情形。现在看来,买卖人口违背人性和道德要求,但在封建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却是官府允许的合法行为。也就是说牙婆买卖人口的行为是当时社会允许的谋生方式。只是明律规定奴婢可以买卖,但不可买卖良人。但在实际生活中,好色之徒的纵欲需求常常违背法律,牙婆买卖人口的行为也就突破了法律边界。与其谴责牙婆可

恶,不如直指根本,批判产生人口买卖的罪恶制度和男性的纵欲需求。全面批判牙婆有欺负弱者却回避根本之嫌。其次,即便转卖人口、诱拐妇女均为牙婆所做之事,但其背后也往往有诱骗或掳掠女子的男性元凶,且行凶、杀人等暴力之事均出于男性之手,如陆五汉、金海陵、赵昂等男性好色之徒,是他们色胆包天,为一己邪欲,践踏了道德与法律,残害了无辜。牙婆主要是男性恶人的帮凶,就其责任而言是辅助性的和次要的。我们虽怒其可恶,但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其艰难的生存处境。再次,牙婆因为贪财被世人唾骂,但贪财并非是牙婆这种特定群体的原罪。明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中后期拜金主义盛行,市井作风和重利习气已经成为社会的价值标准。如明代李开先的《村女谣》写道:“东庄有个红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一心嫁在市城里,早起梳头烧好香。”^{[18]38}从中显示出当时的女性已经大胆表达嫌贫爱富的择偶观。因此,牙婆的逐利行为并不是特殊的社会现象。再其次,牙婆作为职业女性走街串巷,白手起家,甚至还能养活家人,改变了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家庭经济格局。与一部分思想解放的士大夫的言论相呼应,牙婆在实际行动上让一部分女性获得了身体启蒙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使部分女性真正了解了自己身体的合理需求。身体是生命的根基,对于女性而言,能保有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主体性^[22]。牙婆摆脱了被社会和家庭赋予的淑女、节妇、贤妻和良母的固化形象,她们敢于追求财富和正视情欲,其言行具有一定的女性解放的意义。最后,牙婆走街串巷、牙尖嘴利又贪图钱财的中间人特点只是契合了犯罪工具的属性,在小说中就几乎形成了千篇一律的负面化角色,说明这种工具人和功能性人物的叙事方式过于简单,也表现出“三言二拍”作者塑造人

① “养瘦马”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畸形行业。从业者先出资把贫苦家庭中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调教,教其歌舞、琴棋、书画,长大后卖于富人作妾或入妓院,从中牟利。因贫女多瘦弱,故称其为“瘦马”。

物形象类型化的局限性。

总之,“三言二拍”中牙婆形象基本负面化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上述原因外,其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父权制社会和男性文学传统下的女性形象失真的问题。毕竟中国的媒妁文化历史悠久,大多数牙婆需要正常的说媒拉纤收取佣金养活自己,不能靠坑蒙拐骗谋生,这样只会自砸招牌,难以为继。实际上,牙婆并不一直都是贪财和恶毒的,牙婆也有善良、智慧的一面。牙婆具有难得的“双性气质”:既能像男性一样果断行事、爱财逐利,又有女性的贴心、细心、善解人意。相比起那些只知用恪守妇道的教条来压制女性精神自由的士大夫来说,牙婆的很多行为更具有人情味。这些地位卑微的牙婆在父权制社会缺乏话语权,只能任由这样的负面化形象成为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我们确实鄙薄牙婆唯利是图的职业特点,另一方面,深入探究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群何以普遍被负面化的深层原因依然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5 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59.
- [2] 武荣强. 也释“牙婆”[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81-82.
- [3] 纪德君. 略谈“三言”、“二拍”中的媒妁形象[J]. 福州师专学报,2001(1):46-48.
- [4] 张云霄. 明清“三姑六婆”群体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 [5] 张丽丽. 明清小说中的牙人形象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 [6] 严明,沈美红. 闺阁内的爱情导师:“三言二拍”中婆子、丫环、尼姑的角色分析[J]. 明清小说研究,2006(1):88-101.
- [7] 冯梦龙. 醒世恒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 凌濛初. 初刻拍案惊奇[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9] 冯梦龙. 喻世明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0] 袁采. 袁氏世范:卷 3[M]. 北京:中华书局,1985:57-58.
- [11] 洪应明. 菜根谭:第 5 册[M]. 北京:线装书局,2016:2104.
- [12]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8.
- [13] 唐甄. 潜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63.
- [14] 冯梦龙. 警世通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43.
- [15] 冯梦龙. 古今小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叙 1.
- [16] 冯梦龙. 情史[M]. 长沙:岳麓书社,2003:龙子犹序 1.
- [17] 冯梦龙. 智囊全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75.
- [18] 李开先. 李开先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9] 王虹. 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J]. 社会科学研究,2004(4):93-98.
- [20]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台湾:里仁书局,2009:48.
- [21] 吴自牧. 梦粱录[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18:336.
- [22] 沈红芳. 在苦难中升腾: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 当代文坛,2008(5):137.

(责任编辑:李秀荣)